



思想战线

Thinking

ISSN 1001-778X,CN 53-1002/C

《思想战线》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早期汉族移民与西南边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作者：李东红
网络首发日期：2025-05-22
引用格式：李东红. 早期汉族移民与西南边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J/OL]. 思想战线.
<https://link.cnki.net/urlid/53.1002.C.20250521.1131.004>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早期汉族移民与西南边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李东红¹

摘要：秦汉以来，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移民，与“西南夷”土著人群杂居共处。历经两汉、魏晋的发展，到南朝时期，汉晋文献记载的西南夷“僰、夜郎、滇、越雋、邛、笮、叶榆”等土著族群，以及“秦民”“汉人”“晋民”“郡人”等内地移民称谓全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爨”“乌蛮”“白蛮”“僚”为代表的、自称有汉人祖源与内地祖籍郡望的新人群。说明两汉以来迁入西南夷的内地人民，与当地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凝聚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此后二千多年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繁荣发展的基本力量。汉代以来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经验证明，政治统一、族群融合与文化凝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基本途径，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根本力量。

关键词：西南夷；早期汉族移民；夷汉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①秦代一改春秋战国以来的血缘政治传统，以地缘为基础设郡立县，建立起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②汉承秦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体现在大一统政治制度上，渗入“中华教化”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之内，彰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汉代以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就成为每个时代的潮流。^③

在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书写中国历史的伟大洪流中，“汉人”与“四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④地处“巴蜀以西以南”的“西南夷”，从“四裔边地”成为汉王朝的郡县之后，^⑤汉人移民与西南夷土著人群长期交错杂居，交往交流交融，最终融合发展为具有汉人祖源与内地祖籍郡望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一、内地移民与郡县制度在西南夷的确立

秦汉时期，往往将关中、中原地区的大姓豪族移居蜀地，再由蜀地迁往西南夷、南粤。《华阳国志》记载，秦并巴灭蜀之后“移秦民万家实之”。^⑥《史记·项羽本纪》则称“秦之迁人多居蜀”。^⑦居处蜀地的秦汉“迁人”，有的被迁徙至“巴蜀徼外”的西南夷，譬如《华阳国志·蜀志》“严道县”条说：

秦开邛来道，置邮传，属临邛。始皇二十五年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于此地，汉为县，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早期汉族移民与‘西南夷’社会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23MZA00457）；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南诏大理国研究”创新团队成果

作者简介：李东红，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教授（云南 大理，6710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

①《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8—239页。

②朱乃诚：《21世纪初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特点、成果与展望》，《考古学集刊》2010年第1期。

③陈星灿：《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9日。

④范丽珠，陈纳：《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历史文化逻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⑤《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9—1602页。

⑥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

⑦《史记》卷7《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页。

故曰严道，属蜀郡。至文帝，又徙淮南王之族于此。^①

“邛崃”是蜀郡与邛、笮之间的大都会。秦时将楚地“严王之族”迁徙至邛崃，因严氏置“严道县”。汉文帝时又徙“淮南王之族”于此。这是西南夷地区因大姓、移民而设县的诸多实例之一。

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巴、蜀四郡为基础经略西南夷。^② 汉初，由蜀郡分置广汉郡，同时设置蜀郡南、北、西三部都尉。汉武帝以此为基础，大规模经营、治理西南夷。^③ 具体说来，建元六年（前135年）分蜀郡与广汉郡设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以邛都为越嶲郡，笮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年）以滇国为益州郡。^④ 上述七郡与巴蜀四郡，隶属十三部刺史之一的益州部统辖。^⑤ 《汉书·地理志》所载益州刺史部管辖的“西南夷七郡”，确立了汉代以降中国西南边疆郡县设置的基本格局。

西南夷郡县设立之后，移民实边成为主要国策。《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条说：

晋宁郡，本滇国也。元鼎初置吏，分属牂牁、越嶲。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⑥

近年来，滇池之滨的晋宁县河泊所出土的简牍中，编号为“J4⑤一号简”可识铭文为“建伶髡钳吴屯代杨闵”，^⑦ “建伶”为西汉益州郡属县，“髡钳”指刑徒，为“五岁刑”；“吴屯代杨闵”，即吴屯此人，代替叫杨闵的人，来此服劳役。汉代“以人代刑”即以别人代替罪者本人服劳役，是较为普遍的服刑方式。^⑧ 此简牍铭文与《华阳国志》所载“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到益州郡的史实相吻合。^⑨ 河泊所H18出土简牍的简文中，有“巴郡”“广汉郡”“成都”等郡、县地名，^⑩ 说明当时迁入益州郡的移民，或者是人员往还，以巴蜀四郡居多。

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将吕不韦的家族门人后裔，从蜀郡迁往益州郡西部，设置不韦县。《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不韦”条注引孙盛《蜀世谱》说：“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⑪ 说明秦时吕氏被迁至蜀地，汉代再将其后裔迁入西南夷。《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孝汉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耆溪，置寓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⑫ 这是汉代移居西南夷的内地移民开拓澜沧江地区的记载。中原王族大姓徙边，迁入西南夷，应该是那个时代常有的事。有关汉代移民进入澜沧江地区的文物遗存、考古发现较多，譬如博南古道、兰津渡霁虹桥，以及不韦丞印封泥等古迹文物至今犹存。^⑬

《汉书·两粤传》说：“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颜师古注曰：“适有罪者，徙之于越地，与其同土人杂居。”^⑭ 可见设置郡县之时，从内地移民实边，是秦汉时期通行的政策。

《汉书·地理志》开“中国正史”记载历代王朝疆域沿革之先河，在《汉书·地理志》与

①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8页。

②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

③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第141页。

④《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6—2997页。

⑤《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3页。

⑥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

⑦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

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4期。

⑨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

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

⑪《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不韦”条注引《蜀世谱》，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7页。

⑫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5页。

⑬李东红：《博南古道考说》，载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编写组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82—93页；《寻古中国——不韦丞印封泥》，CCTV1，https://ysxw.cctv.cn/video.html?item_id，2023年5月28日。

⑭《汉书》卷95《两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47页。

《后汉书·郡国志》中,“西南夷七郡”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是汉王朝的郡县,说明西南夷完全融入汉代大一统政治体系之中。^①按汉代边郡制度,郡县均有一定数量的内地移民,或为官吏,或为戍卒,或为屯田,朝廷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初郡徙边移民“复除”政策,免除其赋税徭役,同时供给吏卒俸禄、钱粮、货物,保障驿传畅通。因此,汉族移民是郡县设治的基础与保障。

二、内地移民与西南夷交通、邮传网络的发展

秦汉经营西南夷,始于交通。“秦时尝颇略通五尺道”,指的就是在西南夷修筑道路的故事。^②汉武帝“治道西南夷”,巴蜀四郡为之牵动。《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④以“作者数万人”最终修通了巴蜀通西南夷的道路。治道是经营西南夷的基础,与道路相通的是邮传,西南夷交通网络的成熟,其标志是邮传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华阳国志·蜀志》严道县条说:“秦开邛来道,置邮传,属临邛。”^⑤《史记·西南夷列传》“集解”引徐广注说:“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⑥《华阳国志·南中志》南秦县说:“自犍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⑦据任乃强先生考证,西汉郡县设治,犍道为犍为郡属县,其地在今四川宜宾;南广县为东汉朱提郡治所在,其地在今云南盐津县境;平夷县为西汉牂牁郡治所在,在今贵州毕节赤水卫城,而今川南、黔西之叙永、古蔺与贵州仁怀、毕节一带,均属平夷县辖境。^⑧说明由蜀郡通夜郎的“南夷道”沿途均设置邮亭,以通邮传。由治道、通邮进入西南夷的吏卒,当不在少数。

1958年,贵州赫章县可乐汉墓出土“武阳传舍比二”铭文铁炉。^⑨据《汉书·地理志》,武阳为汉代犍为郡治,故地在今四川彭山(州);出土此铁炉的赫章县,属于汉代犍为郡汉阳县辖地。^⑩《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说:“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⑪传有房舍供住宿,有驿马、传车供骑乘。因此,“武阳传舍”是指官方设置的驿站,是保证汉帝国存在与正常运转的基础性国家机构。^⑫“武阳传舍”铁炉的出土,说明从武阳(彭山)至汉阳(赫章)之间,有道路及邮传通行,与前引《华阳国志》“南夷置邮亭”记载相符。

汉代的邮传,首要任务是“置邮传命”,因此邮传是行政管理体系中重要的一环。邮书寄发前要进行封缄与登记。用绳封缄,在结绳交结处封上粘土,盖上印记,以防私拆,这就叫“封泥”或“泥封”。^⑬封泥既可防止泄漏与作伪,又是文书真实性和权威性的凭证。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汉字简牍,发现“滇池以亭行”等记录邮传情况的简牍文字,还有始元四年(前83年)、始元七年(前80年)、元凤四年(前77年)、元康二年(前64年)等

①李大龙:《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与建设途径探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3页。

③《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5页。

④《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46页。

⑤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8—199页。

⑥《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95页。

⑦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8页。

⑧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6页注20。

⑨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⑩《汉书》卷28上《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9页。

⑪《汉书》卷1《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7—58页注2。

⑫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⑬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王国维遗书》第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

纪年铭文。河泊所遗址还出土“益州太守章”“滇国相印”及“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益州郡、滇国官员的印章封泥。河泊所遗址被认为是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同时也是益州郡属县滇池县治故地。^①始元、元凤为西汉昭帝年号，元康为西汉宣帝年号，上距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以滇国之地设置益州郡时间未久（在26年至45年之间）。河泊所还出土了益州刺史章、交趾太守章等官印封泥，还出土了同为益州刺史治下的州郡，譬如越嶲、犍为、牂牁、广汉太守章封泥，以及“益州”铭文云纹瓦当。^②河泊所遗址出土如此丰富的邮传封缄与登记的封泥与简牍，说明那时的益州郡已经形成完备的邮传体系，传达政令的公文往还不绝于途。

据汉代文献记载，西南夷邮传系统有专门的传车、传马及物资供应，譬如《史记·平准书》说：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

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③

这里很重要的是“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也就是说，在南越、西南夷设置的初郡，不仅有常备的吏卒守卫，还有“传车马被具”，即有保障邮传的车马、物质供给。西南夷交通与邮传网络的形成，把西南夷郡县与蜀地相连，进而通达关中，联系全国。

东汉时期，西南夷的邮传制度更为完善。20世纪80年代，汉代越嶲郡故地，今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汉墓群遗址内，发现数十件东汉石表、石碑，其中《越嶲太守碑》（初平三年，192年）是越嶲太守向汉朝皇帝所上奏牍的刻文，透露出越嶲郡移民、屯田、驿传，还有汉代复除制度等重要内容。碑文有“缮治邮亭”一语，专指当地邮传管理情况。同一地点发现的《五曹诏书石表》（光和四年，123年）提及“益州”“邛都”“苏示”等郡县，以及军伍与人民组织如“部曲”“十四里丁众”等，均与西南夷移民、郡县治理有关。^④前引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木牍中，还有东汉安帝元初三年（116年）、顺帝永建五年（130年）、恒帝永寿三年（157年）纪年简牍，内容多为官方往来文书。^⑤说明东汉时期，益州郡的邮传是通畅的。

西南夷考古发现的汉式墓葬，^⑥集中于犍为郡武阳（彭山）、汉阳（赫章、威宁）、犍道（宜宾）、江阳（泸州）、朱提（昭通）、堂琅（会泽），牂牁郡（安顺、兴仁、兴义），越嶲郡治邛都（西昌），益州郡滇池（晋宁）、同劳（陆良）、叶榆（大理），永昌郡（保山、腾冲）等地。^⑦这是巴蜀通西南夷的主要交通沿线，以及西南夷郡、县治所故地。

汉代迁徙边地的内地移民，均聚落而居，死后就地入葬，不再返葬祖籍。^⑧因此，西南夷“汉式墓葬”的发现地点，最能反映内地移民聚居点的空间分布。更进一步说，“汉式墓葬”集

①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

②蒋志龙：《滇文化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证——以河泊所遗址为中心》，《云南文物》第100期（2024年）。

③《史记》卷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0页。

④吉木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残石》，《考古》1987年第5期；刘弘：《从川滇古道上的汉墓看汉代邮亭》，《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昭觉县文管所：《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发现的东汉石表》，《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⑤蒋志龙：《滇文化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证——以河泊所遗址为中心》，《云南文物》第100期（202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大考古终评项目：探古滇国 寻益州郡——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中国文物报》2025年4月18日。

⑥此处所称之“汉式墓葬”，是指西南夷地区发现的实行汉代内地葬俗的墓葬，通常以东汉时期的砖室墓为主，部分延及两晋南朝时期。

⑦唐文元：《贵州汉墓及其分期特点》，《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内部编印，昆明：云南省博物馆，1982年；张增祺：《古代云南的“梁堆”墓及其族属新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罗二虎：《四川汉代砖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杨勇：《云贵高原出土汉代印章述论》，《考古》2016年第10期；霍巍：《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汉代移民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

⑧《汉书》有“募民相徙以实塞下……营邑立城，制里割宅……为置医巫，以求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居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之说。参见《汉书》卷49《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第2288页。

中分布的地点，同样是交通、邮亭的关键地。^①

三、早期汉族移民与西南夷“夷汉杂居共处”格局的形成

先秦以来，“夷夏共居天下”的大一统观念，已然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为“五服四裔”所接受。^②任乃强先生说，《史记》之《大宛列传》与《匈奴传》，称秦时边远地区的汉民为“秦人”，汉时则称为“汉人”。南北朝时，称移居边远地区的汉民为“晋人”。文献上所称的“夷晋”与“夷汉”含义相同。^③因此，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夷，历代皆以朝代名号称之。如秦时称“秦民”，两汉时期称“汉民”，两晋时期称“晋民”等等。西汉武帝开拓、经营西南夷以来，有关西南夷族群的记载中，往往“夷汉”“民夷”对举，“夷”是当地土著的泛称，“汉”与“民”为迁入、落籍西南夷的内地移民。

具体地说，秦汉时期，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巴蜀、关陇等地的“秦民”与“汉人”通过多种途径，大批移居西南夷，成为当地民族群体中的新成员。早期汉人移民与西南夷各土著族群杂居同处，形成土著族群与汉人移民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以笮都夷设置沈犁郡，十四年之后，即天汉四年（前97年），又将沈犁郡撤销，并为蜀郡西部属国，设置夷、汉两都尉，即“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④说明西汉中期的蜀郡西部属国已经是夷、汉杂居同处之地，已然达到“夷汉参半”的程度。

从汉武帝时期到东汉初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西南夷居民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说：

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孝明帝初，广汉郑纯独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表荐无数。上自三司，下及卿士，莫不叹赏。明帝嘉之，因以为永昌郡，拜纯太守。^⑤

“夷汉歌咏”之谓，说明自汉武帝“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以来，大量汉人移民进入“极边之地”。而永昌郡的设立，编户齐民，犹如内地郡县。因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称“俾建永昌，同编亿兆”。^⑥

蜀汉时期著述，凡提到西南夷（南中）的地方人民，多为“民”“夷”并举，可知当时内地人民移入定居的已经不少。^⑦《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说，张嶷曾任越巂郡太守十五年，后来随姜维出陇西伐魏阵亡，“南土越巂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祭之”。^⑧说明越巂郡同样是民、夷杂居共处之地。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孟获者，为夷、汉所服。”^⑨此处以“夷汉”指南中居民。《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记载：“蜀建兴三年，丞相亮之南征，以郡民李恢为太守，改曰建宁，治味县。”^⑩“郡民”即汉人移民，说明李恢是晋宁郡汉人移民大姓（后裔）。

晋代，“夷汉”改称“夷晋”，《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说：“南郡霍戈为参军，戈甚善参毗之礼，遂代宇为监军、安南将军。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夷、晋安之。”“夷、

①刘弘：《从川滇古道上的汉墓看汉代邮亭》，《四川文物》1990年第3期。

②《史记》卷4《周本纪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页。

③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9页。

④《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9页、第2854页。

⑤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7页。

⑥《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0—2861页。

⑦江应樑：《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载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4—94页。

⑧《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4页。

⑨《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21页。

⑩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

晋安之”即夷人和晋民，都各安其土。^①《华阳国志·南中志》建宁郡说：“味县，郡治。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②亦含“夷晋”之语。《晋书·杜轸传》则有“杜轸，除建宁令……风化大行，夷、夏悦服”之语，^③则晋时亦以“夏”指称西南夷之汉人。

南朝时期，西南夷更有“宋夷”“齐民”等称谓，这是与当时南朝刘宋、萧齐统治有关。《爨龙颜碑》称爨龙颜离世，“黎庶痛悼，宋夷伤怀”。^④以“宋”指代当地汉民，“夷”指土著族群。《南齐书·州郡志》说：“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南中，诸葛亮所谓不毛之地也。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⑤“齐民”是指南朝萧齐时期西南夷的汉人。

在西南夷族群叙事中，通常以僰、夜郎、滇、嵩、昆明、邛、笮、冉駹等称谓，指称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之前的族群，当时并未出现秦民、汉人的记载。自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之后，文献中开始出现“夷汉”并称或“夷民”对举的情况。到东汉时期，描述西南夷族群时，“夷汉”“民夷”并举已成常态。由此可见，自汉武帝时期以来，汉人移民逐渐成为西南夷诸多民族群体中的一员。内地移民的迁入与定居，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西南夷从此就是夷、汉各民族共有的家园。这是西南边疆各民族相互认同、和睦相处的历史根源。

两汉时期移入西南夷的内地移民，各有宗姓，互为婚姻，他们与土著族群之间亦互通婚姻，史称“遑耶”。通过交错杂居互通婚姻，与当地土著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⑥

南朝至初唐时期，《史记》、两《汉书》所载西南夷土著族群的称谓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东爨”“西爨”“白蛮”“乌蛮”“僚”等新的称谓，与此同时，有关汉人移民的记载日渐减少甚至消失，说明汉晋间迁入西南夷的大量汉人移民，已经完全融入当地族群之中，并促成了西南夷族群的分化与发展。^⑦新出现的“爨”“蛮”“僚”等族群往往“自云其先本汉人”，并声称有秦汉“三辅之地”“三晋之地”“巴蜀四郡”的陇西、天水、洛阳、巴蜀等祖籍郡望。^⑧说明汉代以来西南夷族群的接触与交流，并非是单向度的“汉化”或者“夷化”，而是彼此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凝聚，发展出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族群。^⑨

四、早期汉族移民与中华文化主体地位在西南夷的确立

秦汉时期，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确立，大一统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以“中华教化”实现包括“四裔边民”在内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就成为国家政治的最高目标。^⑩

西汉武帝开拓西南夷，郡县制度确立之后，以汉式器物、汉字、内地礼俗为代表的文化习尚，影响并逐渐取代了西南夷土著文化。从考古学的视域观察，秦汉以来，西南夷就存在两种类型的文化，即“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与“汉文化”，两种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就是中华教化逐渐成为西南夷主体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到东汉后期完成，

①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7页。

②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2页。

③《晋书》卷90《良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31页。

④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⑤《南齐书》卷15《志第七·州郡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03页。

⑥江应樑：《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载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4—94页。

⑦方国瑜：《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人文科学》1957年第2期；苍铭：《云南汉族的来源》，《民族工作》1997年第10期；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⑧李东红：《夷汉歌咏：汉代西南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第393页。

⑨李大龙：《“民族”不是中国古籍固有用词——兼论东西话语体系的错接》，《思想战线》2024年第2期。

⑩范丽珠，陈纳，蒋璐杨：《人伦日用间的中华教化：滇西南不同族群生活世界的知识社会学解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

东汉初年，牂牁郡汉族移民后裔“郡人”尹珍，先赴内地学习，学成后还乡讲学，教化乡里。《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牂牁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颇尚学书……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授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名德。历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①

有关尹珍的事迹，亦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②任乃强先生说，尹珍所拜的两位老师，都是当世鸿儒。尹珍东汉初年将经学传入牂牁，较西汉初叶蜀守文翁兴学，相距二百年，同具推进社会文化之功。文翁兴学，立即产生严君平、司马相如等著名学人；尹珍讲学，同样培养了傅宝、尹贡等牂牁人士。^③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东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鸟见，始兴文学，渐迁其俗”。^④《东观汉记》卷13《王阜传》亦载：

王阜为益州太守，边郡吏多放纵，阜以法绳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静，百姓安业。时有神马见滇河中，甘露降，芝草生，白鸟见，连有瑞应。世谓其持法平，政宽慈，惠化所致。^⑤

“白鸟”作为神鸟，在先秦以来的文献中被广泛提及。《尔雅翼·释鸟》说“乌本黑之称，故《瑞应图》以白鸟为太阳之精，至孝之应”。^⑥“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与“甘露降，白鸟见”相连，其结果是“始兴文学，渐迁其俗”。说明东汉时期，益州郡政治清明，人文蔚起，汉文化与内地礼俗已然成为社会风尚。

云贵川三省区域社会记忆中，常以“梁堆”“僇堆”“坟丘墓”“老包”指称西南夷东汉至六朝时期的汉式墓葬。^⑦“梁堆”的形制、随葬的“汉式器物”组合，以及墓葬本身所反映的“内地礼俗”，代表的是汉代内地“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惯，是我们探讨西南夷汉族移民文化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云南昭通出土永寿二年（156年）《孟孝琚碑》，称墓主“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文中用“孔哭鱼、路哭回”以慰其父。^⑧体现的是典型的儒家文化，是内地文化与礼俗深刻影响西南夷的证据。

西汉中、晚期以来的西南夷社会，无论官方行政文书，学校授课，还有器物铭文，碑刻、墓志，都使用汉字汉文，使用中原王朝年号纪年。有关西南夷族群、社会历史的记载，都是以汉文书写，并载之于正史。汉字文书、汉文献、汉文碑刻的流行，改变了西南夷土著社会无文字的历史与文化面貌。

五、结束语

早期汉人移民与西南夷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历经两汉、魏晋到南朝，形成“汉人祖源”与“内地祖籍郡望”为标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汉代对西南夷的经营与治理，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西南边疆的政治发展、族群结构与文化取向。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经验证明，政治统一、族群融合

①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0页。

②《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5页。

③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2页。

④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7页。

⑤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2—513页。

⑥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尔雅翼》，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141页。

⑦唐文元：《贵州汉墓及其分期特点》，《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内部编印，昆明：云南省博物馆，1982年；罗二虎：《四川汉代砖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赵殿增：《金沙江流域早期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⑧周钟岳等纂，王珏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与文化凝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文化逻辑。

The Early Han Immigrant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Area

LI Donghong

Abstract: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inland immigrants mainly composed of Han people have lived together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he Southwest Yi.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by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ll the indigenous ethnic groups recorded in the Han and Jin literature, such as Bo, Ye-lang, Dian, Yue-Xi, Qiong, Zuo, and Ye-yu, as well as the terms for Mainland immigration, such as Qin people, Han people, Jin people and Jun people, had disappeared. In their place came some new ethnic groups of people represented by Cuan, Wuman, Baiman and Liao, who claimed to have Chinese origin and ancestral home in the interior.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 inland people who moved into the southwest Yi have interacted, communicated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local ethnic groups, constantly consolidating and fusing, forming a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here each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other, which has become the fundamental force for the soci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of China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thereafter.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since the Han Dynasty has proved that political unity, ethn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cohesion are the basic ways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the fundamental force for the long-term stability,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s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Keywords: Southwest Yi, The early Han immigrants, Han People and minority ethnic integr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 廖国强)